



研究报告

(2018 年 第 19 期 总第 50 期)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2018 年 7 月 4 日

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与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鞠建东¹

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

摘要

中美贸易争端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这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深刻体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结构变化、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有其长期性与必然性，是对中国长期、既定的渐进发展轨道的冲击。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正确路径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贸易冲突成为一个中短期的冲击，经过 5 到 10 年的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健康发展，并建立统一而开放、高效、平等、包容、普惠、多样化的中国产品、要素与技术市场，建立成熟的“中国式”

¹ 作者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感谢陈骁、苏立、王润秋和余心玓在本文写作过程的讨论与帮助，作者文责自负。

制度；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接近原定的中国长期发展目标；推动一个崭新的高效、平等、包容、普惠、多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推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 全球化的结构变化 中美经贸关系 第四次工业革命

1. 引言：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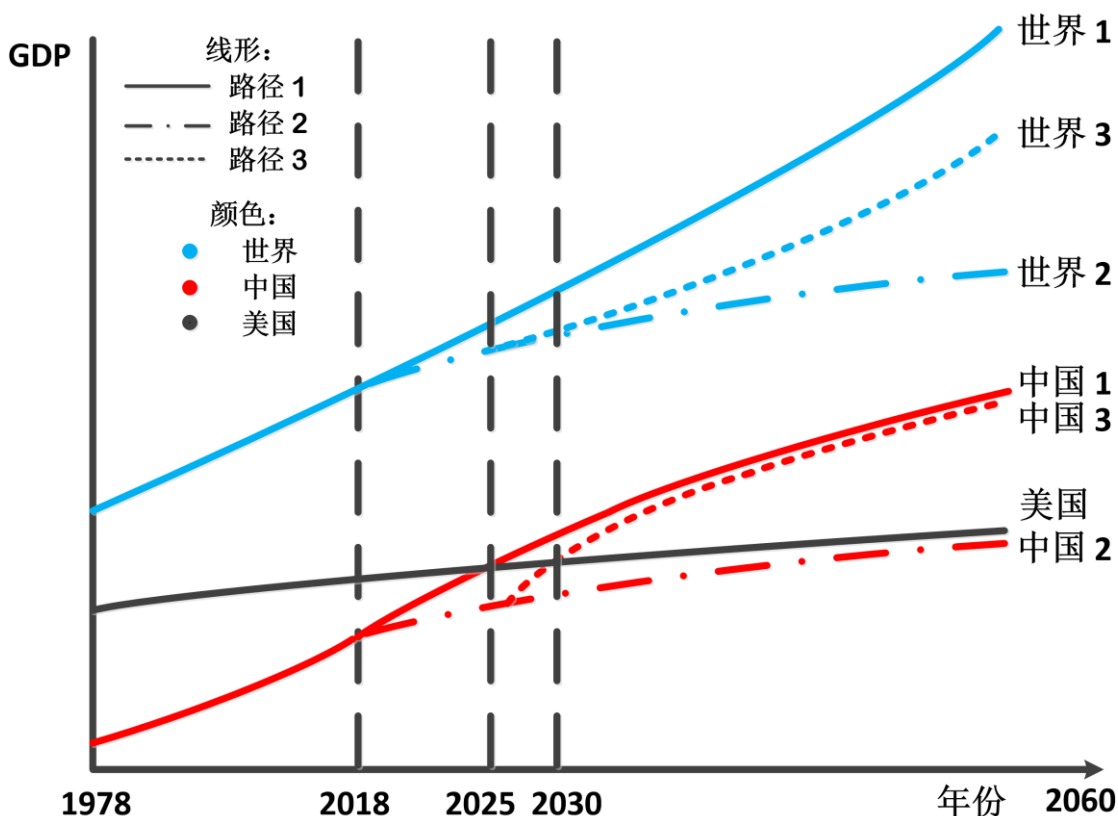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长期发展路径

图 1 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世界、中国与美国的 GDP，解释了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三种可能路径。世界、中国、美国的增长路径分别由蓝色、红色、黑色



代表。中国经济增长路径 1 是没有中美贸易争端的正常路径。2018 年之前，中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为 9.5%，美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为 3%。在正常路径下，2018 年之后，我们假设中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为 4.7%，而美国 GDP 平均增长速度依旧保持 3%；中国 GDP 将于 2025 年左右赶上美国，并在 2060 年达到美国 GDP 的 2.5 倍左右。世界经济生长的正常路径由世界 1 的蓝线表示。中国的正常增长路径 1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8-2018 年的 40 年以数量扩张为主，2018 年以后以质量提高型为主。

经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各国的经济体制在不同的实践、道路上不断演变。人类历史 2000 多年来的发展，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显著区别于欧美模式。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亚洲国家，比如日本、新加坡的经济体制和欧美模式有明显不同。即使在欧美国家，大陆民法体系的德、法与北欧国家，也和英美普通法体系的体制有显著差别。中国经济体制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走了一条市场导向、双规渐进、政府组织推动、面向世界市场的发展道路。40 年来的高速增长证明了这样一条“中国道路”是成功的。对于“中国道路”，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看法认为，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市场体制是理想的经济体制，而美国市场体制最接近这种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道路”是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过渡，是一种阶段性的体制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是多样化的，“中国道路”是扎根于中国历史、传统、1949 年建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实践，



在全面学习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在对全球经济开放的环境中，逐步演变、发育、成熟但显著区别于欧美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式制度和发展道路。笔者持第二种看法，本文的“中国道路”特指第二种看法。

笔者对“中国道路”的看法基于如下四个原因：第一，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定义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数学抽象：所有企业和消费者都是独立的价格接受者，随机地在市场上相遇，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决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完全与完备，那么市场价格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数学抽象完全忽略了市场组织的作用，类似于物理学对一桶水中无数分子的随机碰撞的描述。如果市场组织类似于人，完全竞争模型将人描述为数量巨大的分子的随机碰撞组合，和同样数量的水分子的随机碰撞组合并无二致。人就是一桶水分子吗？人的组织器官呢？一堆水分子的随机组合就是手和脚吗，就是心脏吗，就是大脑吗？大脑为什么指挥四肢呢，四肢为什么要平衡呢？这些问题，完全竞争模型都抽象掉了。当然，市场组织不同于人的器官组织，但也绝不是一桶水分子。正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忽略了市场组织的发育、生长与成熟，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发育、生长与演变的描述是苍白无力的，假设理想市场机制犹如一桶水分子的随机碰撞是过于简化了，甚至是误导。第二，人既有个体的独立性，也有集体的社会性。经济组织将个人有机地组成集体。集体不是个人的随机、简单的相加。由下而上（个人到集体）的加总，与由上而下（集体到个人）的分解，是经济组织的不同侧面。



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与计划经济模型是两个极端，都不是现实经济组织的理想状态。市场经济组织因为其发育、成长的路径、历史不同，必然呈现多样性，必然是路依赖的。美国经济体制，因为其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多地反映了个人主义的侧面；而中国经济体制，因为其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多地反映了集体主义的侧面。美国和中国市场的无数企业，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将企业有机的集中起来。这种集中方式，美国可能通过少数垄断企业，商业领袖对行业的领导，而中国可能通过各级政府对企业的组织。过去 40 年的增长经验来看，美国和中国作为增长最为强劲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组织相比于全球其他国家，都显示出优异的组织效率、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发育过程中。如果将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削足适履地套用到正在发育过程中的中国市场体制之上，会限制、扭曲了中国市场体制的健康发育，可能会寄生出一个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市场体制怪胎，或者陷入到家族式的官僚资本主义与社会动荡的痼疾。第三，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欧美理论界、政策界对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正在进行中，而美国市场经济体制也面临改革的巨大社会压力。特朗普行政当局的粗暴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由企业推动的全球化的直接干预。如果中国的市场加政府组织经济的模式缺乏活力和竞争力的话，在美国与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美国为什么要如此反对、甚至恐惧中国的经济组织模式呢？体现了强大竞争力的中国



经济组织模式为什么不能继续完善、发育与生长，反而要按照竞争对手美国的要求改弦更张呢？第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尤其是诞生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成熟欧美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巨大挑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各国经济制度都需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崭新生产体系，并做出革命性的调整。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由于还处于生长发育期、尚未成型，因而可以更快、更容易在人工智能生产体系下发育成熟。这种适应人工智能生产体系的“中国道路”，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并对全球经济体制适应于崭新生产力做出巨大贡献。

回到图 1，在 2018 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到质量型的发展道路的转变，要求路径 1（即使没有中美贸易争端）在 2018 年之后的发展阶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要素市场发展。“中国道路”还在半途之中，还不成熟，还需要依次进行开放战略调整、制度发育与文化复兴。没有“中国道路”的成熟发展，我们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

2018 年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对中美贸易的直接干预，对中国、美国、世界经济都是一个冲击。这个冲击也会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不改变美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美国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目的很清晰，就是要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维持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按照正常增长路径 1，2060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 GDP 的 2.5 倍，这样的话，美国将无法维持对世界经贸的主导权。2018 年美国对中国正常发展路径的



干预，如果成功，就要维持美国 GDP 对中国 GDP 的领先（主导）地位。这个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成功”干预由中国增长路径 2 代表：在 2060 年，美国 GDP 依然维持对中国 GDP 的领先地位，中国发展路径 2 在 2018 年之后显著偏离了正常发展路径 1。在后文中我们将讨论，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引发了中国经济的 1) 日本式停滞，2) 前苏联式危机，3) 金融危机，都有可能打断“中国道路”的健康发育和成熟，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混乱和崩塌，演变成增长路径 2。

我们对中美贸易的正确应对由中国发展路径 3 代表。中美贸易争端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骤然变化，这对中国发展路径产生巨大冲击。无论中国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调整，或者下降，这由 2018 年到 2030 年增长路径 2 和 3 与正常路径 1 的偏离所代表。但是正确的应对路径 3，在面临外部环境的骤然变化下，我们主动调整开放、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坚持“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使得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成为一个对“中国道路”的中短期的冲击，经过 2 到 3 年理清思路、5 年建立调整框架、10 年调整到位，10 年之后我们的增长重新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的发展目标。正确应对的路径 3 的核心，在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有效处理中美贸易冲突，使之成为我们增长路径上的短期冲击，通过主动调整，使我们在 5 到 10 年的调整阶段之后能够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路径。而失败的应对路径 2，是将中美贸易冲突演变成对我们发展路径



的长期冲击，与发展方式的长期偏离。

在本文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对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与结构性因素，以及政策建议做更为细致的讨论。第 2 节讨论全球化的结构变化，第 3 节讨论中美关系的演变，第 4 节讨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第五节讨论可能出现的危机，第六节讨论政策建议，第 7 节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2. 全球化的结构变化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结构出现了深远的变化，这也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我们从图 1 中可以看到，自 2012 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趋势，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按总出口计算）已连续 5 年下滑，自 2013 年起连续 4 年低于 3%。2015 年的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 13.6% 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6 年虽有反弹，但仍为负增长；2017 年首次出现 3.8% 的恢复性增长，为 2011 年以来最快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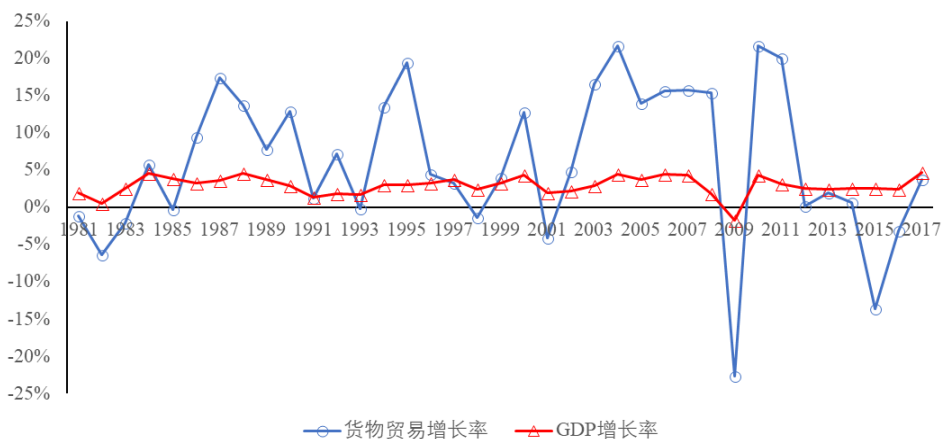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经济增长率和货物贸易增长率

另一方面，从表 1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相对全球而言，进入“新常态”；我国的货物贸易增速在逐年下降，而全球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在逐年增大；我国已经和美国、德国一起，成为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表 1 我国经济贸易格局变化

	1980-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数据说明
全球 GDP 增长率	2.9%	2.6%	2.6%	2.7%	2.4%	3.8%	世界银行/IMF
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	7.3%	2.4%	0.2%	-13.6%	-3.2%	4.7%	WTO 按出口额计算
中国 GDP 增长率	10.1%	7.7%	7.3%	6.9%	6.7%	6.9%	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货物贸易增长率	15.9%	7.5%	3.4%	-8.0%	-6.8%	14.2%	WTO/中国海关总署
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比	1995: 56.61%			2011: 63.75%			TIVA 按出口额计算
全球服务贸易占比	1980: 16.27%	2000: 19.07%	2012: 19.48%		2016: 22.9%		WTO 按出口额计算
前三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1980	2000	2012		2016		WTO
	美国: 11.73%	美国: 15.48%	美国: 10.44%		美国: 11.48%		
	德国: 9.26%	德国: 7.96%	中国: 10.39%		中国: 11.44%		
	日本: 6.61%	日本: 6.51%	德国: 6.87%		德国: 7.43%		
	中国: 0.92%	中国: 3.60%					
是全球多少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2000	2012		2014		UN Comtrade *各年数据覆盖的国家(地区)数量存在差别
		美国 (47/168)	美国 (29/161)		中国 (24/127)		
		德国 (22/168)	中国 (21/161)		美国 (21/127)		
		法国 (20/168)	德国 (18/161)		德国 (21/127)		
		中国 (4/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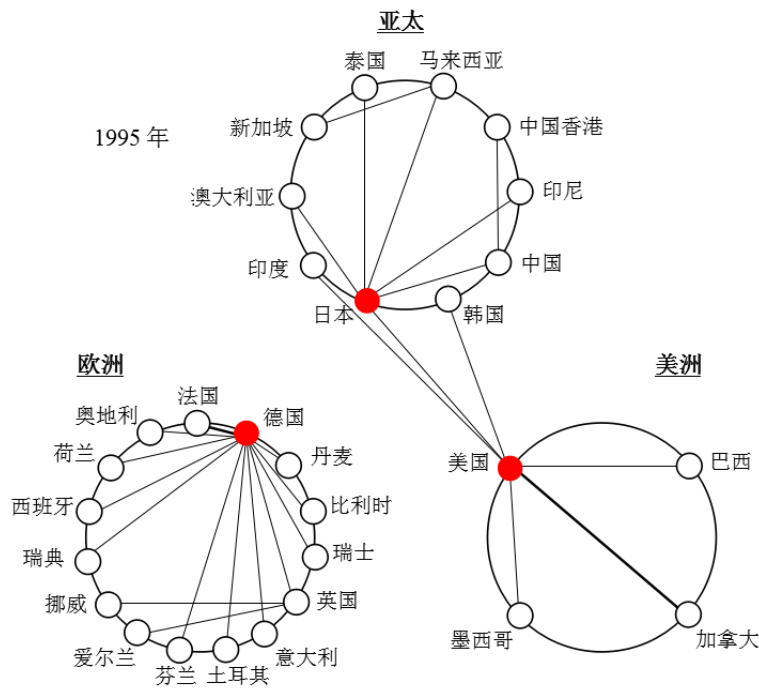
结合上述我们认为，全球化的结构出现新的变化，由原来“旧常态”下“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转变为“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形成了以“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为核心的“三足鼎立”的新结构。这种全球经济贸易的常态性、结构性变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结构性的演变。

“旧常态”的两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美国核心是指以往的“旧常态”下，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一直是以美国为核心。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其中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同时，美国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中国驱动反映在2012年之前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全球贸易增速。在2012年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源于四个因素：首先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其次，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WTO之后贸易制度成本，尤其是关税水平的下降；最后，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这四个因素均在中国得到了体现，使中国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另一方面，“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为：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



结构。从 2013 年起,美国的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贸易正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被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下图所描述的分别是 1995 年和 2014 年占全球贸易总量 80% 以上的前 30 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图中,各国(地区)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以直线相连,粗体黑线则代表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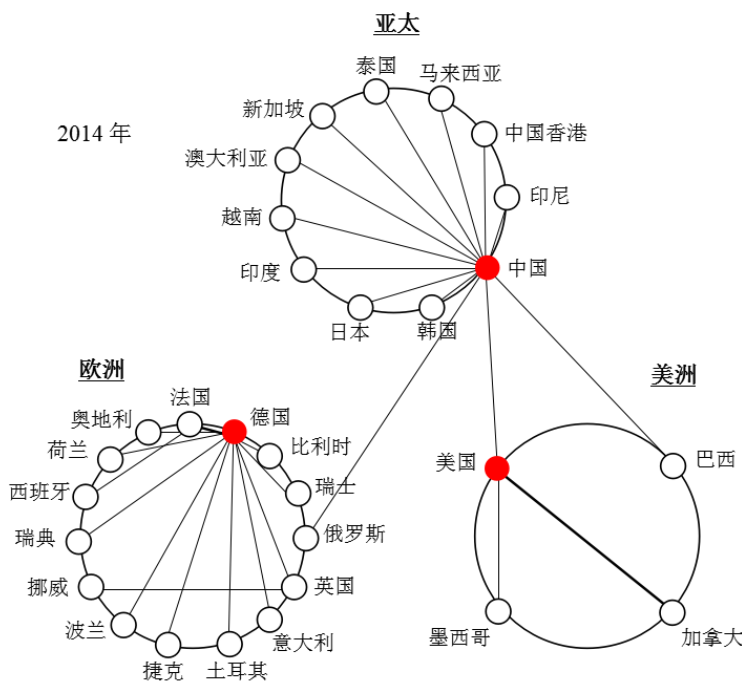


图 3：全球贸易依存网络

从这一贸易网络的演变中可发现，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 1995 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从 1995 到 2014 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 17 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3. 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博弈的阶段变化。表 2 结合两国的数据，利用简单的动态模型，模拟了中美两国在正常路径 1 下的经济增长。我们采用了两种预测，高预测是购买力平价（PPP）下的 GDP 增长，低预测是 2010 年不变价美元下的 GDP 增长。

表格 2：中美 GDP 发展趋势与预测

年份	2011年国际美元PPP下的GDP			2010年不变价美元下的GDP		
	中国GDP	中国GDP增速	中美GDP比	中国GDP	中国GDP增速	中美GDP比
1981	7.49E+05	5.10%	0.11	3.59E+11	5.17%	0.05
1990	1.73E+06	3.90%	0.19	8.30E+11	3.91%	0.09
2000	4.67E+06	8.40%	0.36	2.24E+12	8.49%	0.18
2005	7.43E+06	11.30%	0.51	3.57E+12	11.40%	0.25
2010	1.27E+07	10.61%	0.83	6.10E+12	10.64%	0.41
2013	1.61E+07	7.80%	1.00	7.77E+12	7.76%	0.49
2014	1.73E+07	7.30%	1.05	8.33E+12	7.30%	0.51
2020	2.56E+07	6.58%	1.34	1.23E+13	6.48%	0.64
2030	4.62E+07	5.68%	1.85	2.23E+13	5.94%	0.86
2033	5.43E+07	5.41%	2.01	2.65E+13	5.78%	0.93
2036	6.33E+07	5.14%	2.16	3.12E+13	5.62%	1.00
2040	7.66E+07	4.78%	2.36	3.87E+13	5.41%	1.09
2050	1.17E+08	3.88%	2.75	6.37E+13	4.88%	1.32
2060	1.62E+08	2.98%	2.94	9.97E+13	4.34%	1.52
2070	2.08E+08	2.08%	2.88	1.48E+14	3.81%	1.66

将高预测与低预测取调整之后取平均值，我们将中美经贸关系大致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9（中美建交）



中国基本不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市场

第二阶段：1979-2010，小国（中国）与大国（美国）

当一国的 GDP 小于他国的 1/2 时，定义为小国与大国关系。1980 年中国 GDP 不到美国的 10%，2010 年是美国的 1/2。

第三阶段：2010-2025，潜在大国（中国）与大国（美国）

中国的 GDP 大于美国 GDP 的 1/2，但小于美国 GDP。按照我们的预测，中国 GDP 将于 2025 年前后追上美国。

第四阶段：2025-2040，两大国关系

从 2025 年-2040 年，中国 GDP 从和美国 GDP 等量，逐渐增长至美国 GDP 的两倍。

第五阶段：2040-2060，共建新世界阶段

我们预计，2060 年，中国 GDP 将接近美国的 2.5 到 3 倍；2100 年，美国人口将达到 4 亿-6 亿，中国人口将达到 8 亿-15 亿，两国人均 GDP 接近。在小国与大国的第二阶段，作为小国的中国，无法影响世界价格，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小国，中国的最优策略是“韬光养晦”。中美经济结构互补，中美关系以合作为主。在潜在大国与大国关系与两大国关系的第三、四阶段，中美两国生产结构从互补转变成互补与竞争，两国经贸关系也由合作向竞争与合作转变。尤其是 2018-2028 年，很可能是竞争主导。在 2028 年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回到健康增长的轨道，中美关系将逐渐走上正常的轨道，而在 2040 年之后进入共建新世界的合作阶段。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偏离了增长路径 3，陷入增长路径 2，中美关系有可能



长期不稳定。

4.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的霸权地位，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当下，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回顾从 18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产生大国利益的重新洗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工业 1.0”，开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因此被称为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工业 2.0”，开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其标志是电力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得以形成，因此也被称为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工业 3.0”，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标志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出现，也被称为信息时代；最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人工智能（AI）产业为代表，以 2013 年 4 月，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德国“工业 4.0 工作组”公布《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 4.0”战略的建议》报告为标志，即“工业 4.0”的开始。



中美人工智能九大领域融资分布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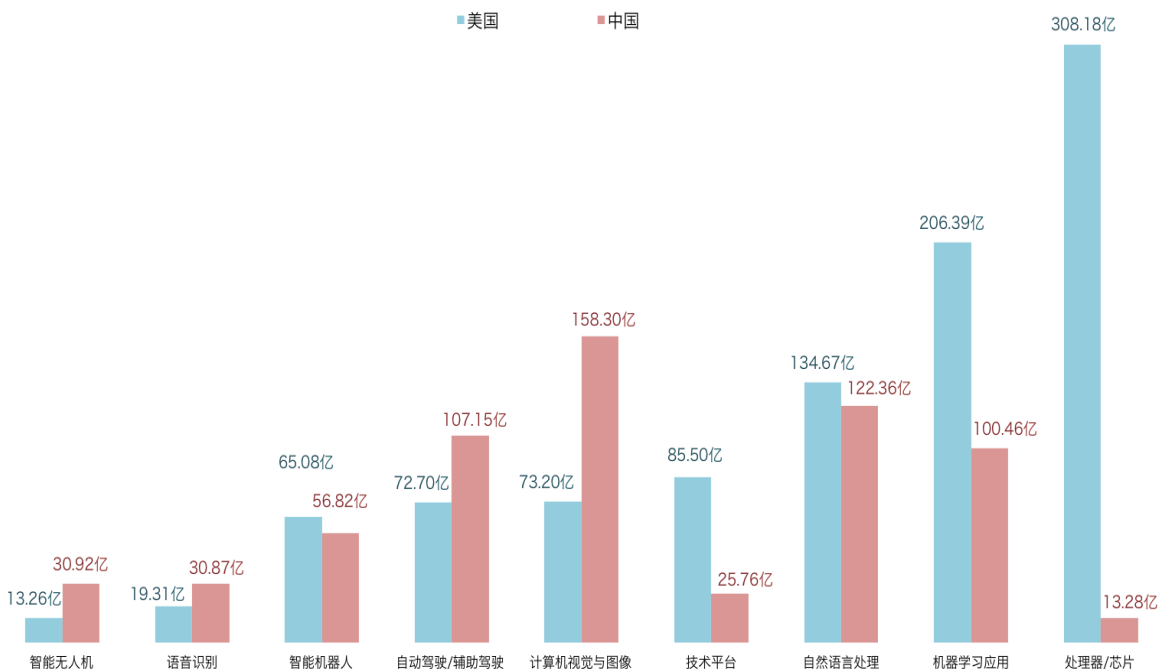


图 4

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和第二大产业国，企业数量、技术专利等位居全球前列。如上图所示，美国 AI 布局全面领先，基础层、技术与算法层和应用层均有重要的技术创新，在芯片、算法、数据等核心领域有明显优势；中国更注重应用层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与美国差距明显；在企业数量上美国全面领先中国，基础层和技术层的企业数量约为中国的 2 倍，但是在应用层差距略小。

人工智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规模的容量，数据量的大小决定了技术的发展。以人脸识别为例，中国企业拥有的数亿样本量推动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与超越。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市场容量、相对灵活的数据市场、与坚实的电子制造业基础。正是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



业发展态势的焦虑，并触发中美贸易争端。

5. 三种可能的危险

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触发中国经济的三种可能危险。第一是日本式的停滞，第二是前苏联式的激进政策变化与“改弦易辙”，并引发经济的崩溃，第三是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美国紧逼，日本退让，避免贸易战升级；日本被迫限制钢铁、半导体、电信等高端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日美贸易战之后，日本高科技产业结构调整不力，日元被动升值导致出口失去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出现“产业空心化”。国内投资迟缓，并形成股市和楼市的“泡沫经济”，最终经济增长停滞，带来“失去的20年”。

前苏联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增长停滞后，迫于美苏竞争压力与国内社会压力，转而采取激进的改革政策。1992年初用“休克疗法”，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迅速摧毁了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1990~1997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1997年的GDP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57%，工业产出下降约67%。按1990年的官方名义汇率计算，俄罗斯1990年的GDP为美国的18.8%，中国的2.8倍。到1997年，分别为美国的5.5%、中国的50%。而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分别只有美国的1/10、中国的1/5。

中美贸易争端正逐步在商品贸易、双边投资、国际金融市场展开。自从美联储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趋紧，全球资本向美国市场回流，阿



根廷、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金融动荡。如果汇率出现长期的大幅贬值压力，引发金融资本外逃，造成资金链断裂，引起生产下降并进一步加深贬值压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如果危机发生，有可能在数周之内使得 GDP 大幅下降，其后果不亚于一次中型战争。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生危机的南亚国家至今尚未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

防止这几种危险，并由此引起中国经济陷入路径 2 的增长轨道是我们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底线。

6. 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聚焦于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关于体制改革、中国文化复兴等“中国道路”的其他主要内容，另文讨论。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核心是由服务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小国开放战略，调整到以建设中国市场为核心的大国开放战略。中国市场已经接近于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零售总额有望在 2018 年超过美国，中国制造业产值是美、德、日三国的总和还多。按照 OECD 的预测，中国专利年申请量也会在近期内超过美国，而领先全球。“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建立统一而开放、高效、平等、包容、普惠、多样化的中国产品、要素与技术市场，建立成熟的“中国式”制度，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服务于这个核心。

第一，建设亚洲共同体。目前，全球已形成了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多元化的全球经济结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的区域化格局相适应。在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



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下，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三足鼎立”的现实格局是：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 1993 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欧洲，1993 年成立欧盟（EU），至 2015 年已有 28 个成员国；而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 FTA 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亚洲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我们可以借鉴 NAFTA 及欧盟经验：深度的 FTA 合作均存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区域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发挥中枢作用，其余经济体则以“辐条”形式，与这一核心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设想，以历史渊源和文化遗产为纽带，以现有经贸联系为基础，构建“亚洲共同体”。具体而言，可以分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达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以多边贸易和跨国投资为核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各国之间贸易的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的区域内全面开放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实行产业结构跨国调整和转移。第二步，达到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关税和建立一致的对外关税，形成“亚洲共同体”内无壁垒的共同市场，逐渐实现劳动力在区内的自由流动。第三步，形成共同货币区（首先建立区内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紧密联系），实现建立区内货币体系的战略目标，降低贸易和结算成本，增强金融稳定性。



亚洲共同体的建设可以参照亚投行模式，由中国主导，以亚洲国家为主，对全球国家开放，各国自愿加入。同时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形成亚投行、亚共体、亚基金三位一体的亚洲区域经济治理体系。

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困局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力打压。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建设，我们会在亚洲形成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 20 到 30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会极大地促进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打破美国的高技术压制，推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现。

第二：解绑中美货币政策。中国的国际金融体制与美元紧密捆绑，集中表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相对固定、缺乏弹性的汇率，并由此带来中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被动捆绑。人民币与美元的缺乏弹性的汇率，使得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都由美元来计价，稳固了美元的世界地位，但带来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缺乏弹性的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供求，不能对冲国内经济波动的风险。而且汇率相对固定，就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来防守。相对固定的汇率目标如果守不住就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本身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可能触发点。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会保持国际货币的强势地位，但美元政策以美国利益为政策驱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缺乏弹性，会让中国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中美经济由合作走向竞争，人民币应该果断地与美元脱钩，实现浮动，这样人民币才可以与欧元一起，推导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向多元化转变。另外，亚洲共同体以中国市场为核心，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捆绑也不利于亚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需要谨慎。中美贸易争端，中国最为脆弱的是金融市场。如果资本市场过快地开放，会加大资本外逃、或者热钱涌入的风险。我们需要构建有效的金融资本跨境流动防火墙，应对危机阶段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第三：建立开放而安全的技术体系。中国技术体系总体落后于美国，更为特出的是，相当多的关键技术中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非常低，有些完全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技术总体上落后，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分工所致。既然可以从美国进口技术部件，国内企业也就生产其他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了。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使得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技术体系的安全性问题，逐步实现关键技术不再完全依赖与境外垄断企业。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和建立竞争、高效的中国技术市场是一致的。如果某种技术产品的中国市场是竞争而不是垄断的，境外垄断企业很难超过中国市场占有率的 70%，那中国技术市场的安全性问题也就大大降低了。我们需要考虑一定的进口替代策略，使得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用 5 到 10 年时间，从 0 逐步增加到 30%。

7. 结论

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建设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洲市场。西方不亮东方亮，堤外损失堤内补。将中美贸易争端控制成对“中国道路”的阶段性冲击，在 5 到 10 年的调整阶段过后，回到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轨道。

(2018 年 7 月 4 日)